

## 听涛茶舍

Lifestyle

■ 故事

## 智讨借款

文/宗学哲

我们全家都是工薪阶层,说来本没有什么钱可往外借。但老家的一些亲戚朋友却认为我在“大银行”上班,应当富得流油。

老家有一个初中同学,上学时我们可谓情同手足。一日,他找上门,说自己办了一个小化工厂,急需一笔资金进原料,让我帮着想想办法。我只好如实相告工资收入减少、孩子上学负担加重等苦处,但他却说你在银行上班,帮着贷点款也行。我说如今银行对贷款要求非常严格,再说这也不是三天两天能贷下来的,只能看以后有没有机会。谁知他倒有一种穷追不舍的精神,不住地变换借钱的角度;你在城里认识人多,帮着借借也行。并信誓旦旦地承诺只用半个月,等厂子货款回笼了便立即还上。

看老同学一脸的诚恳,再说也是当年好友,话说到这份上,要是不帮忙确实说不过去。于是,我便将预备年底要交房款的3万元积蓄借给了他。老同学感激涕零,挥泪而去。

转眼半个月过去了,老同学却不提还钱之事。给他打电话,他说资金临时周转困难,说下个月一定还。我想,厂子刚刚投产,难处肯定不少,于是我便又耐心的等了一个多月。谁知,再次找他时,他又是说了一大堆难处,说再过十天就给我送来……就这样一而再,再而三的推托,眼瞅着交房款的日期马上就到,可还钱的事还是没影儿。

我只好一遍遍地给他打手机,可他却说啥也不接。往办公室打电话,接电话的人一听我是厂长的老同学,便说厂长不在。后来我为这事弄得夜不成寐,早晨不到5点,我就往同学家打电话,铃振了半天,他妻子接起电话,但一听是我,“他……他……”地咬着半天,说“他出去跑步去了。”我知道这肯定又是撒谎:在农村老家,放着正经活不干,天不亮就出去跑步,那不成神经病才怪呢。

这几万块钱可是我们全家的命呀,就这样泡汤实在不心甘。真是人急了眼什么招都能想出来,几天来苦思冥想,我还真想出了一个“以骗治骗”的“绝招”。

想起了同学曾提出让我帮忙贷款,我便给他发了个快件,说贷款10万元已有眉目,请速带抵押手续前来签合同。你别说,这招比一百遍电话还管用,今天发了信,第二天他就急火火赶到了我单位。并带来一袋红薯,说了一大堆感激和道歉的话。

我说:因为急需交房款,你先把借款还给我,然后马上帮你办贷款,但前提是用你的五十铃客货车手续作抵押。他满口答应。然后,我到门口的一家储蓄所要了三份空白的贷款合同(各银行都在推销消费贷款,贷款合同可以到柜台领取),让他一本正经的填写了贷款内容,并让他盖了公章,按了手印。见我说的有鼻子有眼,事儿做得一本正经,贷款合同也是真的,再说他说啥也没想到我也会骗人。因此,签完合同的第二天他便把借款还给了我。

这回该轮着他着急了。我和办公室的同事及家人说,凡是同学找我一律说不在或说我出差了。又过了几天,他诚惶诚恐地来到单位找我。我说,因为你的抵押手续不符合要求,所以没有批准。虽然这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,但他还是知道:这回是上了我的“当”了。

文/高辉清

去年,我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在美国过了半年的留学生生活。

来到宾州大学之后不久,我发现中美科技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异:在中国从事科研工作的人一般都非常辛苦,却很难出大的成绩;少数人能够作出世界级的成果,却又常常英年早逝——据不完全统计,上世纪80年代以来50岁左右就猝然撒手的中国杰出科学家就达十多个。在美国,虽然研究出成果也不太容易,相对而言出的成果却容易多了,而且许多都是世界级的成果。更为关键的是,这些取得重大成就的学者一般都还活得又长寿又快乐。我的导师宾大经济系Klein教授(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)现年84岁,每天还要工作8-10小时。而宾大医学院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教授已年过九旬,每天还骑着自行车上班,工作时间更达10小时以上。

为了找到产生这一巨大差异的答案,我曾经与多位朋友一起谈论过。结果发现,大家常提及的营养问题、体育锻炼问题、收入问题等都不足以给出完全的解释。最后,我们把结论归结到中美科研文化的差异上。

大家都知道,美国人推崇个人成功。但并非每个人都清楚,这种成功与国人理解的成功有些不一样。我们常说的成功者往往是指

■ 视点

## “农村人比城市人更幸福”的背后



配图/万永

文/傅勇

日前,《2005年社会蓝皮书》中公布的“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”调查结果显示,目前中国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,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;幸福感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,而有钱不等于幸福,财富仅仅是带来和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之一。

无独有偶。最近一项国家重点课题研究表明,在城市中产阶层尚未形成气候的背景下,农村已经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——农民工;而在城市疲倦了都市生活而向往乡村田园,以吃农家菜、玩农家乐为时尚之时,农村人整日待在城市人向往的生活中。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,只要城乡居民互换居住地,将会

一举提升社会总体福利。

如上调查研究的结论显然同城乡居民收入、福利水平的巨大落差格格不入。现实是,近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1997年的2.47倍,持续扩大到2003年的3.23倍。考虑到城乡居民在其他实物和潜在福利上的差距,中国城乡差距可能是世界之最。从购买力上来说,《2005年社会蓝皮书》引用了国家统计局2004年9月底的入户调查数据,城镇每户家庭拥有彩电133台、电冰箱90台、空调69台、钢琴2.2架、家用汽车2.1辆、移动电话109部……我不知道如果这个调查放到农村,能够得出什么样的数字,但不可否认的是,农村居民更幸福无法在物质层面上得到说明。

为此,有人怀疑调查的可信度,认为农

村地区的样本过小并且可能缺乏代表性。撇开这点不说,假定调查结果是真实的,那么,难道农民的幸福感真的超脱了物质生活吗?恐怕很少有人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肯定答案。那么,应该怎样看待农民的这种“无端膨胀”的幸福感呢?

答案可以很简单,幸福完全是自我感觉的东西,农民收入虽低,但小富则安。联系到2004年农村的大好形势,这似乎更好理解,2004年农村居民整体增收近千亿,其中粮价上涨增收600亿,各种补贴增收296亿,这是近10年来难得出现的一个亮点。因此,农民朋友喜上眉梢、幸福感增加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?然而,透视农民自我感觉良好背后的尴尬,足以令人担忧。

农民良好的幸福感反映了农村整体生活水平较低。西方经济理论中有一个相对

效用假说,意思是人们的满足感主要取决于与同层次其他人生活状况的比较,而不完全由自身的生活状况决定,这种效应被称为“keep up with Jones”(与邻居琼斯家保持一致)。也就是说,相对于同自己联系最密切的人而言,一个人的生活水平越高,则幸福感越强烈。对绝大多数农民而言,生活圈子不过方圆几十里,接触到的乡里乡亲同自己的生活状态极为相似,心理上不会有太多的不平衡;而外出打工有机会见世面的年轻人,由于户籍制度等不可逾越的障碍,无法融入城市,其参照系仍在农村,而不是城市。城市居民则不同,周围人群收入消费差距巨大,身边富有人比比皆是,这种来自比较的压力足以抵消绝对收入水平较高所带来的满足感。因此,调查结论实际上反映了农村生活水平的整体低下,不只是农民“小富则安”的心理在作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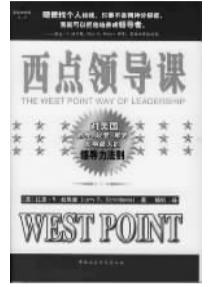
另外,从人们对生活期望来说,农民幸福感更强,只能说明农民对前途的黯淡情绪。幸福感类似于满足感,它实际上是现实的生活状态与心理期望状态的一种比较,两者的落差越大,我们可以认为幸福感越差。城市居民幸福感更差的原因是有着较高的期望,从侧面表明城市居民的社会上升渠道畅通,人们有能力有机会追求更好的生活。而农民“知足常乐”逻辑的背后是无力追求更加幸福生活的无奈,试想谁不想过上工作稳定、保障充分、社区便利的生活?谁不想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?但农民理性地预期到,这些尚是无法企及的奢望,因此他们选择满足。

在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的中国,理应伴随着农村人口的市民化,让其平等地享受现代化的丰硕果实,然而,农村居民却“不合时宜”地先满足起来。笔者认为,农民幸福感更强所折射出的是当前社会的深层问题,是一个不良信号,应引起人们的反思,而不是兴奋。

■ 荐书

## 《西点领导课》

作者:拉里·R·杜尼嵩  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1月第一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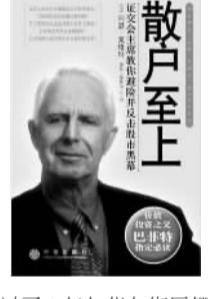


西点军校是美国一所世界闻名的军校,它不仅培养了许多军事人才,更培养了许多各类领导者,有统计显示,由西点军校培养的商业领袖比哈佛商学院还要多。因为西点认为,领导一事绝非儿戏,军事领导者手中掌握着他人的生命。担当如此重大的责任,需要勇气、决断、正直和自我克制,而且每一品德都必须做到最好。

在西点军校,新生从入校起,每时每刻都在学习一门最艰苦的功课:品德。他们学会如何对自己说出的话负责,时刻把组织的需要放在对个人得失的考量之上。西点的行事标准主要有:建立一个尽责的工作团队,克服一切障碍;最大限度发挥每个人的天赋才能;面对危险(压力)保持旺盛斗志;提前演练,随时准备应对危机;通过竞争与合作刺激、提升群体的活力等。(森森)

## 《散户至上》

作者:阿瑟·莱维特 葆拉·德怀尔  
中信出版社 2005年1月第一版



在经过了8年与华尔街巨鳄的猫鼠游戏之后,美国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·莱维特,以一本惊世骇俗的名利场无处不在的陷阱。作者以自己的亲历质感,告诉投资者怎么样才能把一切掌握在自己的手中:如何正确解读公司财务报告?分析师的建议暗藏何种陷阱?员工股票分红究竟对股东有什么影响?会计师怎样帮企业做假账?公司治理与恶劣的企业文化有何关系?

在本书中,莱维特写出了投资者必须了解的所有事情。其丰富的例证和生动的经验描述及精采的论述,使此书成为每一个证券金融市场投资者避险的利器。(森森)

■ 幽默

## 代码

股嫂虽然亏了不少,但依然一门心思地钻研各种炒股技术指标和参数,长期抛不出时间收拾家务。一个周末,股嫂觉得挺内疚,担心老公发脾气,就彻彻底底地把屋内打扫了一次。谁料,老公遛弯儿回到家就大发雷霆:“桌上的灰尘哪儿去了?晌午我听收音机发现了一匹大黑马,就把代码用指头记在桌上了!”(李想)

## 全赖垫背的

小股东电话咨询:“伙计,你们变脸也太快了,就这么几年功夫,圈来的几个亿就折腾光了,成了ST公司。”

董秘答:“这能赖我吗?原先最烂的公司都退市了,本公司惟一的遗憾就是没了垫背的。”(李想)

## 兜圈子

大户室的一群股民外出,坐上长途大巴后,车启动出发,不料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。

如此反复多次后,老王有些不耐烦了。客客气气对司机说:“师傅,别兜圈子了,赶快走吧!”

司机连声“是是”,可就是不动,呆一会儿,启动了,又是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处。老王正欲发火,同室的刘阿姨赶紧把他拉到座位上。

刘阿姨轻声对老王说:“你炒股多年,这还不理解,人家还有3个座位没有坐满,这就好比庄家主力盘吸货,不吃饱喝足收集筹码他能给你把股价拉升得高么。炒股需要耐心,坐车也需要耐心!”(胡蝶)

■ 观潮

## “豪宅热”必须降温

文/徐胜源

记得在去年夏季,一辆豪华轿车“宾利”以106万美元(折合880万人民币)的价格在北京拍卖成交。当时有人算了一笔账:我国农民目前年人均收入不到2500元,按照这个标准,一个农民要用3648年的收入,即从商朝开始挥汗如雨地干到今天(还要不吃不喝),才能买到这辆豪华车。

但与超级豪宅相比,“宾利”还只能算小巫见大巫。去年底由世界地产研究院评出的我国2004年十大超级豪宅排行榜,单套售价1.3亿的上海紫园别墅居榜首,名列十大排行榜中的豪宅每套平均售价4602.5万元,看后令人惊讶。

近两三年来,我国房地产热不断升温,“豪宅热”更是热浪扑面。支持“豪宅热”的一种观点认为:中国有很多富豪,建豪宅是鼓励富人消费,增加税收,促进经济发展。果真如此吗?如果从豪宅的市场风险、资源配置效率

和对经济的拉动等方面进行一些分析,我们会发现“豪宅热”对经济发展弊大于利。

首先,豪宅市场的风险是巨大的。开发豪宅无疑有很高的利润诱惑,但同时又需要高投入,并伴随着高风险。豪宅是房地产高端市场的顶尖部分,满足的是极少数人的个性化需求,先不说项目的选址、地段、品质等技术性风险,仅就市场容量而言,其蕴含的风险也不可忽视。支持开发商大量投资豪宅市场的数据是:我国拥有100亿美元以上的富人约20多万,富人的金融资产已有7万多亿人民币,这构成豪宅市场潜在的巨大需求。但如果结合国情分析,这个潜在需求是要大打折扣的。据联合国的标准,我国仅是一个刚刚步入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,富裕程度总体上还比较低。改革开放20多年来,中国虽出现了富人阶层,但由于转轨时期的不规范,许多富人的收入来源存在各种疑问。我们且不言贪污受贿、非法经营,仅说偷税漏税就会令不少人坐立不安。不是说中国

富人都巧取豪夺,但确有一部分人的收入存在问题,这些人一般是不太敢张扬和露富的。同时,我国也有不少白手起家、勤劳致富的富人,他们勤俭节约惯了,并不愿意过铺张奢华的生活。因此对于我国豪宅的市场容量必须进行客观的预测和估算,不能凭想当然作过于乐观的估计。开发豪宅动辄资金10亿、20亿,甚至更多,其资金来源又多为负债(银行信贷占主要部分),一旦豪宅卖不出去就会把巨额资金砸在手里,不光开发商破产,还会引发大量三角债和银行坏账。笔者在北京亲眼见到不少豪华别墅一片荒凉,不能不对“豪宅热”产生种种担忧。

其次,大肆修建豪宅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。我国资源匮乏,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数的一半。在我国农村,宅基地每户最

多不超过100平方米(约一分多地),但建一套豪宅却占数亩甚至一、二十亩土地,稀缺资源被极少数人占有,不仅是极不公平的社

会现象,而且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展资源

那些在残酷的、零和博弈的竞争中的获胜者。但美国人真正推崇的是那些通过创新而获得成功的人。这两种成功者的根本区别在于,其带来的结果存在着巨大差异。前者的成功是建立在他失败的基础上,社会总体福利不会因此而明显改善。后者的成功则让人从中受益,整个社会因此而得到发展。

美国科研部门的宽容文化还经常地体现为“不给科研人员施加压力”据我所知,在美国大学的一些顶尖级的实验室里,甚至没有任何考勤和业绩考评制度,更谈不上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之类。甚至于出了成果没有表扬,不出成果也没人说你。对美国人来说,科研工作应该是由那些乐意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来做。而对这些人来说,施加压力就完全没有必要了。而事实证明,这些实验室却往往能出好的成果。其中的秘密就在于:在进入的时候,它就注意挑选那些乐意从事科研工作的人。

当然,宽容的思想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。但是,实践证明,要在全社会或者一个较大范围内形成一种彼此宽容的风气,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我的看法是,它需要一个前提,即大家需要形成这样一种信念:这个世界上,最伟大的人和最卑微的人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,任何世俗的荣耀在“人”这个本体面前都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,一部分人天然地认为自己可以高人一等,可以随便地对他人指手划脚,大范围宽容风气的形成则无从谈起。

从西方现代科技实践活动来看,许许多多的杰出成果都得益于这种“创新+宽容+平等”的文化氛围。相形之下,我国的科研体制则明显不同。

首先,它不太善于接受创新的事物,任何与权威格格不入的东西,往往会被斥为旁门左道。记得国内一位著名学者就说过,Klein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篇论文,如果放在国内一些地方恐怕连副教授的资格都评不上。我则认为,Klein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

数量经济模型研制工作,如果是放在我国的一些地方,估计也永远发展不起来。当初,他要是在中国申请这种科研立项,只要有一个说上一句:“数学模型需要严格的假设条件,而经济变化却永远不规范,数学模型怎么能够用于做经济分析?”或者“有效地数学模型必须包含一个前提,那就是历史能够重演,但经济活动却不可能昨日重现”之类的评语,那么他的申请就不可能被批准。

其次,它不太宽容,并充满了功利色彩。在中国,任何一个项目一旦获得资助,则一定要出预定的成果。这就决定我们的科研人员只能从事那些把握性较强、没有多少风险的研究,尤其是那些拷贝型或者缝缝补型的研究。如此一来,大量低水平科研成果源源不断地被炮制出来,但重大创新的研究项目则几乎没有了发育的土壤。

第三,它不认同平等,与社会其他部门相比,科研部门的官本位现象丝毫也不逊色。这使得我们的科研人员做研究时不一定要承受来自学术上的压力,而且还要消化来自非学术领域的压力,即使从事低水平的科研,需要付出的成本与西方同行相比通常也要高出数倍。

早些年,我们就提出要科教兴国,但迄今为止效果并不太明显。现在,我们也许有必要从科研文化中去探寻一下深层次的原因。